

诗集《蜗牛》后记

余怒

《蜗牛》写了近三年,现在完稿了。它分为两辑,每辑124首,第一辑每首12行,第二辑每首9行,我的想法是,在一定的行数之内处理语义进度和语速、节奏、分行方式、空间感、重量感、色彩等因素——即言说和语言——相匹配的问题。在读者眼中,这些作品语感畅达,虽常有跳跃却显得自然,但作品背后我所花的工夫却是他们难以想象的。常常,一首诗要花去我好几天乃至数周时间,磨了又磨,改了又改(有的发表之后又多次修改),我寻求每个字、每个语句都要在它们应有的、难以替代的位置上,像古人一样炼字炼句。杜甫言“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我算是体味到了其中的滋味。

那么我为何要写这样一部诗集呢?记得十余年前在写作诗集《枝叶》时我曾说过:“我绝口不提传统,因为我就在传统中。”对于一个处于汉语语境中的写作者来说,传统是恒在的,是我们已然内化的意识和心理结构,它不仅表现在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建筑、服饰等有形的形态中,更多的还隐含于习俗、礼仪、人际关系、社会契约、宗教和文化仪式,以及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等无形的形态中。一个文盲的中国人,仍是“中国人”,他甚至比那些生长于国外的汉学家更能体味和了解中国文化,比如慧能。因此,对写作者而言,传统就在我们的血液中,在人际交流的语言和口头表述中,在每一个汉字里,它是可以不必专门给以关注的最基本的东西;无它,不能开始写作,但若是着意强调它,就会自立藩篱,无以超越。

在很多人看来,《蜗牛》这些诗与我的那些被人视为“先锋”的诗相比较,是一种“另类”,是我又一次“回归传统”的表现——另一次是《枝叶》。但他们看到的只是表象,我对传统题材(如时间、生死、爱情等)和自然物象(如山水、日月星辰、乡村等)的纳用迷惑了他们。其实,无论是以前的《枝叶》,还是现在的《蜗牛》,与我的其他作品如《守夜人》《猛兽》《个人史》《饥饿之年》《喘息》等一样,都有着相同的、不变的精神内核和心理结构,以及对于语言和世界关系的理解:这个时而看着小桥流水木屋的,与时而看着大桥大坝大厦的,是同一个人——现代人;前面的和后面的情境,皆是相对于我们内心而存在的外在世界——无论什么时代,世界都可简化为物和我。如果硬是要将这些诗与传统扯到一起的话,我愿意将它们戏称为“伪传统诗”。

然而,这样的写作是极其危险的,一不小心就会落入老派象征主义和乡土抒情诗式的陈词滥调的陷阱。在《蜗牛》写作之初,我给自己立下了一个写作目标:要达到“每一句话都是旧的,每一句话都是新的”的效果。一个现代诗人如何处理写烂了的题材和意象,如何让陈词旧句起死回生(有时,我有意尝试去使用一些被深度文学化或庸俗化的词句),这是一件值得琢磨的事;既要使用人人熟知的公共语言,又要藉此说出为语言所遮蔽的个体体验,这实在有点难。但这个问题需要首先解决——这不单是作者语言能力和技艺的体现,更是文本存在的缘由和依据。由此,其他方式的写作才能得以令人信服地展开。我将《蜗牛》确定为即将写作的几部风格各异的系列诗集的第一部便出于这样的考虑。它的有序、简明、清晰的架构,明澈、宁静、枯淡的语境,温和、迂缓、从容的语感将在下一部诗集里被颠覆,变得无序、尖利、浑浊、湍急、纷乱。

短暂休整之后,我又要重新开始。

2018年3月23日



余怒

余怒：诗歌的本质是找到未被语言驯化的自我

余怒(1966—),安庆人,中国当代诗人,“六十年代出生的诗人”的代表人物之一,被评为“中国十大杰出青年诗人”“中国十大先锋诗人”;著有诗集《守夜人》《余怒短诗选》《枝叶》《余怒吴橘诗合集》《现象研究》《饥饿之年》《主与客》《蜗牛》和长篇小说《恍惚公园》;先后荣获第三届或者诗歌奖、第二届明天·额尔古纳诗歌奖、第五届《红岩》文学奖·中国诗歌奖、2015年度《十月》诗歌奖、漓江出版社第一届年选文学奖·2017中国年度诗歌特别推荐奖、第四届袁可嘉诗歌奖·诗集奖等奖项,三次入围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作品被翻译成英、德、日、希腊等多国文字。现供职于安庆供电公司横江集团。

由十月杂志社、慈溪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四届袁可嘉诗歌奖于2019年9月揭晓,余怒的诗集《蜗牛》获诗集奖。

第四届袁可嘉诗歌奖授奖词：

余怒的诗集《蜗牛》由124首12行诗和124首9行诗组成,是一部具有整体构思、结构完整、形式统一的诗集。这些从形式到内容都高度自觉的诗篇,从具体的事物和场景出发,融语言、形式、事物、玄思于一炉,既达

到了对事物、场景、情感、经验的抽象,又保留了独特的感性魅力和语言魔力,也让事物和语言相遇之时所激发的神秘性得以充分展露,显示了优异的诗歌品质。余怒多年来致力于现代汉语诗艺的探索,风格独特,创作丰富,在当代诗界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余怒诗歌的独特性在中国是极为引人注目的。怎样通过诗来传达思想,我认为余怒是做得最好的。从他的诗,我更能体会到法国诗人瓦雷里说的一句有关诗的名言:“诗应该是抽象的肉感。”

——柏桦(著名诗人,西南交通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后朦胧诗代表人物之一)

余怒是当代中国诗坛一个奇异的存 在,即便放在百年新诗的“小传统”背景下,他的写作仍然具有某种“源头性”倾向。近三十年来,他一直执着于汉语语言内部的勘测和发掘工作,寻找词语之间的关联性,

让词汇在相互缠绕和激活中自成诗意。这种不同寻常的写作姿态把他训练成了一位高度敏感而自律的诗人,尽管其间有过几次阶段性的调整 and 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在我多年的跟踪阅读中,余怒应该算是能够给我带来持续喜悦的那类诗人,他身上有一种罕见的开疆拓土的蛮力与果敢,执拗,狂热,一意孤行却又心如止水,如同他那位家乡同胞陈独秀一样,我愿意称他为当代汉语诗坛上的“独秀峰”。

——张执浩(著名诗人,《汉诗》创办人、主编,湖北省作协副主席,60年代出生的诗人代表人物之一)

《蜗牛》诗选

分 享

野生藤蔓，
沿着木头架子攀爬。
那是我它为它准备的。
我想从自然之物那儿分享战栗。
(像从冰块上，敲下一小块冰。)
或者站在橘树下，
摘下一颗橘子，拿在手中，
用众所周知的语言谈手中的感觉。
极简主义的我，有一颗灌木之心。
坐在石凳上，左手
抓住右手，保持住沉默
(信任它并依赖)。让我成为我的诗。

(2015)

旅 客

一个秋日午后，
我坐在码头上看书。
一艘轮船因故障停泊。
几个男女倚着船舷，笑着望着我。
多年前，我也坐过轮船，也那样
注视过码头上的人们。
为同时存在而相互惊奇，
按捺住不喊对方。
来之地和去之地，漂移变幻。
我从不为身在书中还是身在
现实中而为难自己，觉得哪儿不对劲。
永远都有不知身在何处的恐惧净化我。

(2016)

自省篇

在清泉流泻过而今干涸的溪谷里，

我孤单一人，择路攀爬。一路上我自问：我会客观地看待这个世界吗？回答是：“不能”。即便有人回答“能”亦属正常。他们履行父母或情侣的义务，可能不是全部，而是约定的一小部分。为此必须保持身体秘密。犹如卵石间吞下数倍于己的不明猎物的非洲岩蟒。流畅的凸起。听从温润本能。

(2017)

旷野美学

火车疾驰时所见的旷野，
有着恋爱的意味。三两株杨树，
展开遂成杨树林——如同我在语言中感受你。在天黑之初，
感受晚风是一种物质，头伸到车窗外，
看到天空由蓝变紫，而后我希望自己是世界。可能每个人都有这么想的时候，
称自己有一颗棕鸟的心。

(2017)

停 留

田野里有那么多诗人喜爱的意象，而我认识的诗人都那么悲观。有龙舌兰和高大栗树之墙的春日，
像痛苦和甜蜜专门围绕我而建的石头建筑。同样的情形：图书管理员在图书馆；
惧怕变化的老人，被养老院孤立起来，
因其珍惜“这里的”，
不允许有物被移动。

(2018)